

谢红星 梅雪 著

Lida Yu Maozedong De
Zhexue Jiaowang

李达与毛泽东的 哲学交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谢红星 梅雪 著

Lida Yu Maozong De
Zhexue Jiaowang

李达与毛泽东的 哲学交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谢红星, 梅雪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004-9306-8

I. ①李… II. ①谢…②梅… III. ①李达 (1890—1966) —哲学思想—研究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B261②B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4763 号

责任编辑 周兴泉
责任校对 周 昊
装帧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56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前 言

今年是李达同志诞辰 120 周年。

李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忠诚卫士，以自己的笔、以自己的生命演绎了他毕生追求理想信念的精彩华章。在其早年，李达通过对中国社会历史现实的分析、对西方先进政治文化思想的学习，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随后的革命实践中，他主要以一个学者，以一个理论家的方式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有他们基于对中国历史社会思考而殊途同归的选择，更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和追求，也体现着李达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和贡献。

当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成熟起来，并且成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巨人时，他的哲学思想，他的思想体系，集中体现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结和提升。这种理论源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又指导着中国革命。李达作为著名的学者，毅然地拥护和接受了毛泽东思想，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很正确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存在”。李达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宣传，对于成长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起到了思想武装、理论武装的作用，从而为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和成熟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主政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期间，更是以政治家、教育家的眼光，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强调办好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并接受毛泽东的建议，身体力行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即使在病重、受到批斗之际，他仍然笃信毛泽东思想，认为对他的批判是“宗派斗争”，念念不忘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历史唯物论大纲》的编写任务。

本书不是一本单纯探讨李达哲学思想或教育思想的书。本书仅从李达与毛泽东哲学交往的过程中，探讨李达作为一个马克思理论家的信仰、追求，以及对毛泽东思想形成、传播的重要作用。

本书也不是一本单纯讨论李达与毛泽东友谊交往的书。本书没有太多的“逸闻趣事”、“野史秘闻”，尽管书中的许多情节反映了李达同志铮铮铁骨、侠义肝胆等人格风范，但我们更多地试图用平实的叙述，介绍两位哲人哲学思想的交流、交融过程。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艰难历程，也是李达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同时，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并把她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学习、来坚持、来捍卫。

今天，我们对李达与毛泽东哲学交往的研探，深刻感受到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对毛泽东同志的忠诚。希望更多的学者都来学习李达满腔热忱、毫不动摇、毫不懈怠地用毕生的精力以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职志的精神，“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怕困难和打击，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①

作者谨识

2010年8月于武大

^① 胡乔木：《深切地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在纪念李达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漫话武大》，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李达与毛泽东哲学交往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1)
一 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	(1)
二 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与社会政治思潮的流变	(6)
三 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深度浸润	(12)
第二章 唯物史观的学习、传播与实践	(18)
一 从爱国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18)
二 唯物史观的宣传和实践活动	(26)
三 携手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36)
第三章 坚持唯物史观 反对本本主义	(41)
一 在湖南自修大学	(41)
二 在国民革命的激流中	(46)
三 反对本本主义	(52)
第四章 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	(63)
一 国统区十年斗争生活	(63)
二 《社会学大纲》的学术成就	(69)
三 李著对毛泽东的影响	(76)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里程碑	(86)
一 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哲学总结	(86)
二 《实践论》和《矛盾论》	(92)
三 毛泽东在实践活动中对辩证法与认识论的展开与应用	(98)
第六章 相聚在香山下	(111)
一 李达三次为冯玉祥讲马列课	(111)
二 促成湖南和平解放	(116)
三 久别后的重逢	(121)
四 为了新中国的诞生	(126)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与普及	(133)
一 宣传历史唯物主义	(133)
二 解说《实践论》、《矛盾论》	(141)
三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研究	(152)
第八章 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	(156)
一 毛泽东与胡适之间	(156)
二 文艺界对胡适派唯心主义的批判	(161)
三 李达对胡适派唯心论的批判	(165)
第九章 在一九五八年	(171)
一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171)
二 “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	(177)
三 “你是理论界的鲁迅”	(183)
第十章 《唯物辩证法大纲》的写作	(187)
一 《唯物辩证法大纲》编写缘起及过程	(187)
二 《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主要内容	(195)
三 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大纲》的批注	(207)
第十一章 在“文革”中	(210)

一 “文革”的发动	(210)
二 李达陷入“文革”的政治风暴中	(213)
三 李达之死	(220)
 余论	 (226)
 主要参考书目	 (230)
 后记	 (231)

第一章

李达与毛泽东哲学交往的 历史和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是适应近代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实际需要而传入中国的。它和中国历史上一切外来思想文化的传入一样，从传入中国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在中国社会变革中发挥作用的“中国化”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不仅有毛泽东那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人物，而且也有李达这样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探讨李达与毛泽东哲学交往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 and 作用，必须使之置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历史演变的大背景之下，考察其合理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起点。

一 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

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思潮和政治思想的历史演进，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这就是，它们深深植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围绕如何解决近代中国社会问题而产生、发展、演进。离开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实际，不仅难以厘清和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纷至沓来、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和政治思想，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性考察和解释也将无从谈起。

中国近代的历史，基本上是沿着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条是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深，中国逐步地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一条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连

绵不断、此起彼伏，中国革命经历着从农民革命到资产阶级改良和资产阶级革命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变化。这两条线索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一）1840年至1842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以前，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之久，而此之后，中国社会则逐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紧紧结合在一起为其基本特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①从上层建筑来说，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集权式的封建专制主义日益加强，“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任何政治权利。”^②

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点。通过鸦片战争结束后陆续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就可以一窥全豹。比如，五口通商，即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协定关税，自此关税税率中国不能自己做主；废除原在广州实行的行商制度，中国被迫实行对外贸易自由政策；领事裁判权制度，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一体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租界，等等。这些规定，在经济上“促进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进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在政治上使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③，清王朝开始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由此可见，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侵略的逐步深入，中国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半殖民地半封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3—624页。

② 同上书，第624页。

③ 同上书，第630页。

建状态日益加深。

鸦片战争使西方列强尝到了甜头，但它们又是如此的不满足，伺机扩大侵略利益。1856年至1860年，英法又无耻地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而沙皇俄国则趁机火中取栗。这次战争以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璦琿条约》等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考察这些条约，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1）赔款由《南京条约》的2100万元激增到白银800万两；（2）损失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国土；（3）开放口岸由五口增加到18口；（4）外国人可以任意在中国各地游历、通商，外国教会也有了在中国各地自由活动的权利；（5）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有了合法依据；（6）领事裁判权有了进一步扩大；（7）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等等。这些规定以及其他一些规定使得中国更深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坑：在政治上，封建王朝日益沦落为西方列强的附庸与统治中国、掠夺中国、镇压中国人民反抗的工具；在经济上，西方列强通过控制中国的出入口贸易和在中国开设工厂与银行等途径，对中国实行赤裸裸的掠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始逐步地发展起来。尽管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不可否认的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加快了这种发展。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下，“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①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企业，“这些企业因为是使用新式机器，雇佣了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来进行生产，已不同于旧的官营工场手工业，所以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② 相较于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洋务派举办的民用工业，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更加突出一些。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诞生。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19世纪70、80年代才开始与买办资本、官僚资本逐渐分离而形成的。而近代中国无产阶级则在此以前就已经诞生了。中国无产阶级最早产生在19世纪中叶的外国在华企业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②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页。

随后又出现在 19 世纪 60 年代清朝官办的企业和 70 年代兴起的民族资本企业中。据估计，到 1894 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总数，已有近十万人^①。“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②

（三）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后，特别是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及《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直对中国抱有企图的日本帝国主义于 1894 年对中国不宣而战，发动了甲午战争，并于 1895 年将《马关条约》强加在中国身上。这个条约充分显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贪得无厌，不仅要求中国将辽东半岛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包括澎湖列岛）割让给它，而且还要求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白银。甲午战争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中国的积贫积弱，加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迅速把中国推向濒于瓜分的境地。5 年之后的 1900 年，西方八国又一次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强迫中国与之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骇人听闻地规定中国给西方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在 40 年内分年付清，还要加上利息，本利共达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除此之外，这个条约还有两条引人注目，一是清朝政府要切实负责严厉镇压人民群众中一切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行动与组织，而对于在这方面做得不好的大小官员都要加以惩办；二是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划出一个外国使馆区，并使这个使馆区实际上成为国中之国，帝国主义各国有权用他们的军队来“保护”其使馆。就这样，清政府完全沦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就已经开始解体的自然经济，战后在许多地区进一步崩溃瓦解，从而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开辟了道路。据不完全统计，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几年（1895—1900 年）间，全国各地新办的私人资本工矿企业，其创办时的资金在一万元以上的，共有 104 个，出现了一个兴旺的局面。尽管同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相比，民族资本的发展在数量上还是很微弱的，但毕竟它是中国社会中从未有过的一种新的生产方

①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 120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7 页。

式，它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要比它在数量上所占的比重大得多。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也登上了历史舞台，一般来说，从大地主、官僚、大商人、买办转化而来的资本家，构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从手工业作坊、中小商人等转化而来的资本家，则构成民族资产阶级的下层。

总之，“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列强对中国每发动一次战争，每签订一次不平等条约，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就加深一次，中国在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就加速一程。到20世纪初，中国虽然在形式上仍保持独立，但实际上完全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①

（四）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不失时机地颁布了许多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清政府时期束缚民族资本发展的障碍。与此同时，在革命势力活跃的海、湖、福、广、浙等地，地方政府也制定了一些保护民族工业发展的政策，为民族资本的发展营造了有利氛围。又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中国民族工商业提供的发展机遇，加之全国为反对“二十一条”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的有力推动，使得1912年至1922年的10年间，民族资本发展的势头持续高涨，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无论从设厂数目、投资规模看，还是从增长速度方面看，都是其产生以来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从1914年到1919年，民族资本共新设厂矿379家，平均每年63家，新投资8580万元，平均每年1430万元，年平均设厂数和投资额均比此前的19年间增长一倍以上。从1913年到1920年，民族产业资本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54%。民族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1920年22%。^②

近代工业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引起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促进了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辛亥革命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资产阶级有所发展的同时，中国无产阶级也有了

^① 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② 同上书，第30页。

进一步发展。从1894年到1914年的十年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由10万人增加到100万人。此后到1919年的五年间，又从100万人增加到200万人。近代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了产业工人这一主体之外，还包括与产业工人处于同等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并与产业工人所从事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种非产业工人，如手工业工人、苦力运输工人、农业雇工、商业和金融业的普通职工等，其总数估计约为4000万人左右。^①中国无产阶级除具有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特点和优点以外，还具有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特点。其一，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这种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国中少见的；其二，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虽少，但由于近代工业的布局 and 结构不平衡，产业工人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陆交通沿线的少数大城市和大型企业中；其三，中国无产阶级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或手工业者，因而他们能够充分了解劳动人民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痛苦和要求，便于发动和组织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建立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广泛的革命联盟。

以上我们用很小的篇幅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和社会阶层状况作了宏观的勾勒。这种勾勒是必要的，它是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思潮发生发展的基础。

二 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与社会政治思潮的流变

在近代，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救亡和发展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两大主题，而其中救亡又处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它是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发生发展和各种政治思潮纷至沓来的根本原因。

（一）中国农民阶级的政治思想——“太平天国”运动。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反抗性，他们自发进行的斗争给了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统治势力以沉重打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① 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鸦片战争开始后,在1841年至1849年的几年时间里,各地各族农民起义即达110次之多,到1851年,终于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马克思在当时就曾指出:“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①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席卷18个省,攻克600多座城市,在南京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政权。太平天国政权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民建立“太平天国”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首先,这一文件提出了平分土地的原则,强调“天下田”归“天下人”,这在实质上否定了地主阶级土地所有权,而这一问题也正是推翻封建社会制度最基本的问题。其次,这一文件还勾画出理想社会的结构,每13155家由军帅一人统管,在军帅下逐级设师帅、旅帅等,其基层是每25家(五个五)设一个两司马,这个由一个两司马统管的25家,不仅是公有制经济的单位,同时也是执行文化教育、武装自卫、司法行政的职能单位。因此,《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它宣布在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之后,要建立起不容许任何剥削制度的公有社会,因此,它表现了高度的革命彻底性,没有一点同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妥协的余地”^②。但这种平均主义的理想天国在现实中是建立不起来的,事实上,《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社会制度从未真正实行过。

由于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提不出科学的有远见的斗争纲领,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近代中国农民革命斗争一次又一次地以失败告终。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历史悲剧有力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固然是一支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如果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的。

(二) 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社会改革思想——“中体西用”。鸦片战争后,由于封建社会内部危机的日益加重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日益深入,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一些社会改良的思想。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一个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以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14页。

②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页。

派为代表。

鸦片战争前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社会改革思想，大致以“政治改革”为其主要内容。龚自珍卒于1841年，严格来说，不能算是鸦片战争后的思想家。作为一位不得志的封建官僚，他对极端的皇权专制、昏庸的官僚政治、衰恶的士习、无用的学风，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批判。在政治方面，主张适当限制君权，提高官僚权力，理顺君臣关系。在经济方面，主张限制土地兼并，防止贫富差距扩大，使财富尽量平均，并努力发展生产。在外交方面，坚决反对英国的侵略，支持林则徐的禁烟斗争。龚自珍开启了晚清时期经世致用的学风，从此中国思想界逐渐活跃起来。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林则徐被誉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最早重视西方政治、军事和文化。他在广州主持禁烟事务时，每天派人“刺探西事，翻西书，又购其新闻纸”^①，《四洲志》、《澳门新闻》、《澳门月报》、《华事夷言》等中国近代最早的涉外书报，就是由林则徐组织翻译出版的。如果说林则徐开了中国近代学习研究西方的先河，那么魏源、冯桂芬、徐继畲则是主张学习西方、实行政治改革的急先锋。以“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著称于世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有如下热情的赞扬：“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才梟杰之王也，涣散七十二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逐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创开北墨利加者佛郎西，而英夷攘之；愤逐英夷者弥利坚，而佛郎西助之，敌弥与佛世比而仇英夷，英夷遂不敢报复，远交近攻，可不谓智乎！二十七部首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在鸦片战争前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的这些“不和谐”声音是时代进步的表现。同时，也不能不看到，他们一方面痛恨封建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又不主张农民革命。因而，他们所期待的独立富强、政治清明的美好前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实

^① 魏源：《道光洋船征抚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北京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18页。

现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社会改革思想，大致以“中体西用”为其主要内容。持这种思想的大都是在政治上颇有势力的大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他们认为，清政府的政教风俗无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只有枪、炮、船、机器。他们提出的所谓“中体西用”的政治主张，简而言之，就是要把西方那些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东西纳入中国封建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之下。正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提出的：“中学为内容，西学为外学”，“新旧兼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中体西用”的提出和得到满清王朝认可的过程异常复杂和艰难，它实质上是对洋务运动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定位。对于“中体西用”的评价，一方面应当看到，它是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为大前提的，这也是洋务运动最终难逃失败命运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它毕竟与传统的、守旧的、顽固的封建思想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讲，洋务运动就是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社会实践。

总之，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在各种危机到来之时进行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救济，还没有脱离整个封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樊篱。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思想是行不通的，这种努力也是不成功的。

（三）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君主立宪”。早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资产阶级“变法”主张的人，比如郑观应、王韬等，但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很弱，对社会影响很小。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较快发展，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法主张迅速发展为一个有相当声势的政治运动，即康有为领导的维新运动。

首先是革命启蒙思想家严复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即在天津《直报》接连发表《论事变之亟》等四篇轰动一时的政论文章。在最后一篇《救亡决论》中，他痛苦地发出了“救亡”的呼号。这一振聋发聩的呐喊表明，先进的中国人在惨痛的事实面前猛醒过来，意识到摆在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一般地谈论什么“自强”、“求富”，而是要直截了当地起来“救亡”。戊戌维新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高潮的。在此后将近半个世纪内，“救亡”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奏起的最响亮的旋律，是一切爱国的中国人士中最具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口号。